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滕星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教育部“211”工程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文化环境 与双语教育

景颇族个案研究

董 艳 著

民族出版社

H2
D753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滕星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教育部“211”工程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文化环境 与双语教育

景颇族个案研究

董艳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董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6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ISBN 7-105-05036-5

I. 文… II. 董… III. 景颇族-少数民族教育-双语
教学-研究 IV. G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32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1 2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作者简介

董艳，女，1963年出生，侗族，文学博士，教育学硕士。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系副主任，民族教育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获硕士学位。1994年在职攻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从事教育学、心理学、民族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3年。参与撰写著作5部，其中《民族教育学通论》（任副主编）系国家民委“九五”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合著）系全国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并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8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同年被公派赴日本进修，并就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问题与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学术研究侧重民族教育学、双语教育，发表论文十余篇。曾赴缅甸、泰国等国家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主编序言

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需要性和可能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

美国的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含移民教育、土著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①等方面。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

^① 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一般指少数民族教育、妇女教育和残疾人教育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

的学术研究领域。

中国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前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西方英美人类学被称为“伪科学”和前苏联的民族学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原因,中国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从而有“民族教育学”、“教育民族学”的学科名称。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以致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由于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是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尚未以教育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田野工作方法扩大关注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楚。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本文不在此加以讨论。但是,在此可以用简洁的语言来陈述,民族教育学是教育人类学的一门主要分支学科。

近 20 年,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走过了与美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头 20 年几乎相同的道路,即从非学术化到初步学术化的历程。随着中国西部开发,许多国际组织机构、中国政府与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视,教育人类学这门学科必将大有用武之地并因而获得广泛的学术发展前景。在此时,民族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第一套《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它不仅是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里程碑,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套丛书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田野工作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我们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贡献。

滕星

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2001 年 8 月

序

个案研究是双语教育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教育中采取何种语言教学，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的日益增多与密切，双语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已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官方或民间的双语教育研究和执行机构，双语政策已成为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同民族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少数民族对双语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带来了双语教育研究领域的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发展也要求双语教育研究能够提高到学科的高度，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将双语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发展，是顺应国际学科发展的大势的，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双语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已提到日程。

双语教育学是教育学和语言学交叉而形成的一个学科研究领域，它是用语言学和教育的理论、方法研究教育教学过程中两种语言的使用和两种语言学习的现象与规律。由于双语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语言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在探索其内部规律时要综合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包括语言学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的分析法，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教育学的观察法，社会学的个案法，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法等。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当前双语教育研究在世界有逐步加温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研究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学科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1. 重视不同民族、

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个案研究。双语教育理论的构建需要大量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深入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非常重要。2. 重视双语教育对比研究。对不同模式、不同类型的双语教育产生的文化背景、具体做法、实际效果、缺点不足等进行对比研究,从比较中发现制约双语教育特点的因素、规律。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相处生活以及历史的不断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民族分布局面,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双语现象也各具特色,所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必须重视微观研究。所谓微观研究就是对一个个民族、一个个地区的双语现象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剖析,寻找其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性。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只有在坚持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出普遍的认识,也才能以此来指导双语教育实践。

董艳博士的《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是目前双语教育研究向理论研究的转型阶段中产生的。这部著作的特色之一是,以景颇族为个案,阐明了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的关系。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中存在着三种双语教育体制:一是以民族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二是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民语文;三是低年级以民族语文授课为主,逐步过渡到高年级以汉语文授课为主,两种语言的课程保持并行。一个民族选择哪种双语教育体制不是凭教育决策者主观意志,也不是专家学者在书斋中凭空想象出来的。双语教育体制的选择以一个民族所处的文化背景,包括该民族的社会生态环境、民族关系、语言社会功能、民族心理、民族教育发展状态等制约因素为依据。只有在文化环境中对双语教育进行科学的梳理,才能发现双语教育的规律。

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现实与功绩”,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论述了景颇族语言文字使用的概况以及景颇族“大纲型”双语教育体制的内容,着重分析了这种体制在景颇族教育中的合理性。第二章“寻根溯源”,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景颇族双语教育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心理因素,对景颇族双语教育依托的母体——民族教育的发展作了追溯,并在此基础上对景颇族双语教育体制形成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分析说明一个民族选取何种双语教育体制是受这个民族的文化环境所制约的。第

三章“矛盾与对策”，根据目前景颇族双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出六对矛盾，并提出了对策性意见。

景颇族双语教育在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景颇族是一个跨界民族，人口较少，分布地区较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本族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有较长的双语历史，不少人兼用汉、傣、缅等第二语言；本民族内部有语言和文字的支系差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保留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的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进入新时期以来，双语现象有了较大的发展……选取景颇族双语教育为研究课题，对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回顾过去，我国对景颇族民族教育和双语教育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来虽然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但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尤其缺乏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该研究力图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利用作者自己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和认识，对景颇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历史、未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分析研究。在理论上，试图从景颇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和历史研究入手，认识属于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并探索其研究方法；在实践上，试图针对景颇族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景颇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特色之二是，全书以系统论作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基本思想。系统论是哲学上的一般方法论。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双语教育的形成、发展与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教育、居住环境等诸多因素相联系。这些因素在双语教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或同时作用，或其中的若干因素相互作用。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制约因素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同民族的双语教育系统所受制的因素在种类上、程度上都不尽相同，因而双语教育系统的特点及措施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将双语教育放入该民族的整体系统中去研究。本书处处把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具体分析制约双语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注意现实与历史、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既考虑到语言因素，包括语言文字的功能、语言观念，又顾及社会对语言的影

响,如民族关系、支系关系;既研究境内,又联系境外。本书还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语言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结合在一起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较厚实的理论功底。

特色之三是,材料丰富、可靠。双语教育研究是靠事实说话,要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做依据。作者通过亲自调查,广泛收集景颇族双语现状资料,而且还从历史文献、文书档案中摘取有用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来自实际的材料比文中提炼的思想更有价值。因为这些材料对以后的深入研究以及其他课题的研究都能不断发挥作用。云南是西部地区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份。在西部大开发的整个工程中,如何解决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任务。双语教育解决得好,能够大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少数民族更有效地投入现代化建设。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这些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很棘手但很重要,必须慎重对待并加以解决。该研究说明,民汉双语教育是保存文化、语言多样性的好办法,该课题的研究不仅能为中国双语教育研究理论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材料,还能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持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提供可借鉴的个案。

董艳博士是我招收的第一个专门研究双语教育的博士研究生。她原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硕士毕业生,受过专门的教育学理论训练,后在我校多年从事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4年起随我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几年来,她对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和世界双语教育扎扎实实进行了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她勤奋努力,朴实求真,肯于钻研,具有较好的从事双语教育研究的素质。景颇族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不少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我希望董艳博士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做新的课题,不断探索新的领域。

是为序。

戴庆厦

2001年8月29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引 言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人类文化的载体。由于有语言，人类才能将已有的知识经验、认识方式、情感体验等传给下一代，由于有了语言的书面表达方式——文字，人类的文化财富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传给未来，传到远方。人类语言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大体上也遵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一般地说，那些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作基础，且人口众多的民族的语言，总是比较容易得到发展；相反，那些文化影响较小，经济和科学欠发达，人口又少的民族的语言，得到发展的机会相对就要小得多，有时其生存都会发生危机。在一些民族众多、语言众多的国家里，许多语言濒临消失。史前时代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在1万至1.5万种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只剩下今天的6000种。在下个世纪又有一半左右的语言会彻底消亡。从长期看只有300种语言的前途是可靠的^①。而这之中有的语言，如上世纪末，随着克尔克岛上说达尔马提亚语的最后一个人死去，这种语言就不复存在了。

计算机网络、卫星电视和无线电话等现代化传播媒体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是对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生存构成危险的重要因素。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教授克罗斯分析说，这一代人变得更实际了，他们只掌握与职业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因此，50%的人类语言面临着死亡的危机^②。

面对人类语言的发展现状，人类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即将消亡的民族语言，因为在今天，少数民族语言已不再被视为原始、落后，而是被看成人类的宝贵财富。多语言是多种文化的象征，人类要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多样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第2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转引自《云南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封底。原载《光明日报》。

性而做出各种努力。为此,各国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挽救面临消亡危机的语言。一是派大批语言学家去记录语言或为这些语言创制文字。加拿大从本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中期,国家博物馆实施了一项“紧急文化人类学计划”,旨在记录整个加拿大范围内那些境遇不佳的社团的文化(包括语言)。二是有计划地在学校中使用这些语言,通过教学使这些语言保存下来。马恩语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消亡的,但不久前人类学语言学家发现有些老年人还会说马恩语,于是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培训,现已有200至300人(主要是成人)作为第二语言学会了它^①。挽救濒临消亡的语言的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于1994年2月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研讨会上,语言学家们有感于人类语言的危机而呼吁以第二或第三语言的形式将一些小族语言保护下来,从而避免它们被大族语言所吞没^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56个民族中有34个民族没有文字。为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国家着手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1956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语文机构共有700多人参加的7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在16个省、自治区对33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语言普查工作。在调查基础上,先后为12个少数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这些文字不同程度地在群众扫盲、广播出版事业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双语教育中使用,为保存这些民族的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世界各国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实践证明,双语教育是保存语言、保存文化多样性的最佳方法,这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开展双语教育不仅使语言少数民族儿童学习语言多数民族的语言,也让语言多数民族的儿童学习语言少数民族的语言,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去了解对方丰富多采的文化,发现世界从它诞生起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组合体。不同文化的

① 文平:《人类学语言学的发展(下)》,《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② 转引自《云南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封底,原载《光明日报》。

存在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不同的发展道路所造成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因此,双语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包容的态度,以平等客观的方式对待异文化。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如果不实行各语言平等、各语言的社团有权选择教育语言的政策,就会产生语言危机,就有可能威胁国家的统一。双语教育不只教会人们学会两种语言,在学习中还传播两种文化,培养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接纳态度,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形成一个国家的多元化和一体化发展的和谐态势,从而缩小各民族间的差距,共同进步。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世界正走向一体化,但文化应是多元的。多元文化的民族政策、多元文化的教育政策成为世界的主流。而双语教育正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西部大开发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工程。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和多民族省份都处在这次西部开发的中心地带。西部开发的目的是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引入新知识新技术,充分利用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展当地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东西部百姓、全国各个民族成员共同富裕,文化共享。然而经济开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使当地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接轨,生产力提高,步入共同富裕道路,这是全国各民族共同期待的目标;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引进、经济的往来与交流、人口的频繁流动、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会使以汉语为传播媒介的中国普遍文化、习俗,包括汉语在内迅速在民族地区传播,深入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在少数民族分享其他文化、掌握科学知识、更新观念的同时,有可能对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带来巨大的冲击。如果在西部开发中经济的发展是以民族文化的弱化或消失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开发就背离了我们决策时的初衷。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这些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我们无法回避而又必须慎重对待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另辟蹊径,通过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民族语)汉(汉语)双语教育,少数民族能成为民族语和汉语双语人,既能运

用汉语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又能保持本民族语言和文化。西部开发必然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较封闭的经济形态转向开放的经济形态,少数民族成员掌握汉语的学习动机随之变得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少数民族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科学的选择是实施切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和需要的双语教育。

西部开发不是一项“输血”工程,而是通过国家重点扶持,在发达地区的投资与支援下,促进西部地区自身“造血”机能的工程。因此,西部地区人口素质是这项工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教育实践表明,少数民族要提高人口素质、普及义务教育,就必须在民族教育中处理好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这就是说,双语教育是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瓶颈”,抓住了双语教育也就是找到了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水平的一个关键。因此,双语教育研究是我国民族教育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中国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以及历史的不断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民族分布局面,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双语现象也各具特色。所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必须重视微观研究。所谓微观研究就是对一个个民族、一个个地区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剖析,寻找其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性。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只有在坚持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出普遍的认识,也才能以此来指导双语教育实践。重视微观研究是我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主导思想。由此,对景颇族双语教育的探索进入了我的研究视角。

景颇族生活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历史上一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在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后,景颇族居住的地区又经历了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和人口大量迁移,但他们的语言仍然保存完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就是景颇族建立了适合他们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民族分布、历史积淀等实际情况的比较科学的双语教育体制。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我选择景颇族双语教育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主要出自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中存在着

三种双语教育体制：一是以民族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二是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民语文；三是低年级以民族语文授课为主，逐步过渡到高年级以汉语文授课为主，两种语言的课程保持并行。第三种体制被我国广大南方民族地区普遍采用。如壮、白、傣、景颇等民族的双语教育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而在这些民族的双语教育中，以景颇族的双语教育发展历史较长、较规范，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大纲型”双语教育体制。因此，景颇族双语教育体制是这种类型中较有代表性的个案。2. 影响景颇族双语教育体制形成的因素复杂，可谓“五脏俱全”。景颇族是一个跨界民族，人口较少，分布地区较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本族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有较长的双语历史，不少人兼用汉、傣、缅等第二语言；本民族内部有语言和文字的支系差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保留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的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进入新时期以来，双语现象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景颇族双语教育在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我国对景颇族民族教育和双语教育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至今留下的成果不多。几十年来，景颇族的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但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尤其缺乏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本文力图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and 认识，对景颇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历史、未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分析研究。在理论上，试图从景颇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和历史研究入手，认识属于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并探索其研究方法；在实践上，试图针对景颇族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景颇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一是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具体分析制约双语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在研究过程中，共时和历时相结合，从共时研究历时，从历时解释现状；既考虑到语言因素，包括语言文字的功能、语言观念，又顾及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如民族关系、支系关系；既看到局部，又面向整体；既重视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利益；既研究境内，又联系境外。二是采取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由于双语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语言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在探索其内部规律时要综合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包括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法、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教育学的观察法、社会学的个案法、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法等，坚持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本书共分三章。第一章“现实与业绩”，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论述了景颇族语言文字使用的概况以及景颇族“大纲型”双语教育体制的内容，着重分析了这种体制在景颇族教育中的合理性。第二章“寻根溯源”，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景颇族双语教育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心理因素，对景颇族双语教育依托的母体——民族教育的发展作了追溯，并在此基础上对景颇族双语教育体制形成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三章“矛盾与对策”，根据目前景颇族双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出六对矛盾，并提出了对策性意见。

景颇族双语教育研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很难在短时期内认识清楚。虽然我为此做了一些努力，但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觉得还有许多问题认识不深，有的问题尚未触及，如双语教学中的教学法问题。尽管如此，景颇族双语教育的研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将成为我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的领域。

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为构建中国双语教育研究理论大厦添砖加瓦，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持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提供可借鉴的个案，以供制定经济政策、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时参考。